中国教育科学进展
Progress of Chinese Pedagogy
2026 年第 05 卷第 03 期
Vol. 05, No. 03, 2026

研究性论文
http://www.scifootprint.com/PCP/index.html

人工智能时代高校劳动教育的价值观异化风险及思政纠偏机制研究

周晓丽*，孙宇涵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绍兴 312000）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在赋能高校劳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引发了工具理性压过价值理性的价值观异化问题。本研究从马克思主义劳动哲学与教育生态学的双重角度出发，系统剖析了价值观异化的表现、机理和纠偏机制。当前，高校劳动教育面临着认知虚化、目标功利化、人的主体性被消解以及实践内容空心化四类风险。这些风险的出现，是技术逻辑越界、评价与体制失序、数字资本规训和具身认知断裂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重新构建“价值理性占主导、工具理性做辅助”的思政纠偏机制：第一，锚定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实现从技术至上向以人为本的转变；第二，推进“五育融合”和虚实结合，重新搭建适合劳动教育的生态实践场景；第三，回归教师的引导，做到知行合一，唤醒学生的劳动主体性；第四，打破单一数据指标，建立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动态评价方式。本研究旨在促进劳动教育生态系统完成从“技术规训”到“价值澄明”的转变，为人工智能时代培养具有主体创造力的全面发展新人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方法。

关键词：人工智能；劳动教育；价值观异化；思政纠偏；教育生态学

DOI：10.48014/pcp.20260614001

引用格式：周晓丽，孙宇涵．人工智能时代高校劳动教育的价值观异化风险及思政纠偏机制研究[J]. 中国教育科学进展，2026，5(3)：53-58.

1 引言

人工智能正重塑着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劳动形态，这不仅为高校劳动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动力，也使劳动教育陷入目标功利化、内容形式化、评价单一化的困境，产生这种困境的深层原因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相互博弈[1]。从表面上看，数字赋能推动了劳动教育形式的更新，可实际上，技术至上的逻辑导致劳动教育逐渐偏离了育人的初心。

结合马克思主义异化劳动理论和教育生态学综合分析，这个困境反映出劳动教育生态系统在智能技术冲击下，出现了结构上的不平衡，即工具理性在认知、目标、主体和实践四大维度全面压制着价值理性，使技术不再局限于扮演辅助角色，而是逐步演变为具有支配、规训和定义作用的主导力量。青年学生的劳动主体性被不断削弱，亲身实践逐渐被虚拟符号替代，日益偏离了“劳动创造人、确证人的本质、发展人”的价值核心，进而破坏了劳动教育生态系统本该有的内在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本研究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劳动哲学与教育生态学的双重视角，透过人工智能技术表层，分析价值观异化的风险和内在生成逻辑，致力于构建一套以马克思主义劳动哲学为基础、以教育生态平衡为价值方向的思政纠偏机制，促进劳动教育打破技术的束缚，实现从“技术僭越”到“人本复归”的理性转变。

* **通讯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周晓丽，20142903@zyufl.edu.cn

收稿日期：2026-06-14； **录用日期**：2026-07-14； **发表日期**：2026-09-28

基金项目：绍兴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145S106）。

2 人工智能时代高校劳动教育价值观异化风险分析

人工智能深入高校劳动教育后，产生的核心风险在于工具理性一步步挤占了价值理性的育人空间。引发劳动教育在认知、目标、主体、实践这些方面出现异化，而且这种异化是各部分互相影响、彼此作用的结果。

2.1 劳动认知虚化

人工智能时代，学生对劳动价值的认知出现了根本性的偏差，劳动本该是一种用来证明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活动，现如今却沦为了可借助算法优化、由智能工具替代的注重效率的任务。“技术万能论”的滋生很容易让学生产生“躺平”心态，从根本上破坏了依靠对象化劳动建立主体性、塑造精神品格的路径[2]。从教育生态学角度来看，智能工具的过度使用打破了教育生态系统原本的价值平衡，技能培训和数字操作被扭曲成劳动教育的全部内容[3]，而劳动精神、价值观与情感体验这些重要的内容反而被边缘化，最后造成了劳动认知的片面发展。

2.2 劳动目标功利化

在技术至上和市场逻辑的双重影响下，劳动教育的目标逐渐趋于功利化，并被简单归结为算法优化、数字产出或是获取可量化学分的过程[1]，而劳动本应具备的审美体验、道德养成与生命意义的建构反倒被忽视。劳动本该是促进人自由自觉创造的幸福实践，现在却异化为追逐外部功利指标的效率工具。依据教育生态学的“最适度原则”，过分追逐某一类目标会打破系统的平衡。当前，劳动教育的目标过度侧重就业竞争力、拿奖学金这些功利方向，已经日渐侵蚀了育人本质这个生态核心。当劳动的价值绑定在流量、数据这些外在标准上，劳动就成了“拜物教”的牺牲品，学生也很难培养出深厚的劳动情怀和劳动精神。

2.3 劳动主体性消解

技术逐步从劳动教育的辅助工具变成了能控制人的宰制性力量，学生逐渐从创造劳动、规划劳动的主体，变成了算法指令的被动执行者[4]。数字劳动和智能劳动这些新的劳动形态，很容易把学生变成和真实社会关系脱节的“抽象个体”。教育生态学注重多元主体之间要有多维度的互动和配合，但过度技术依赖会让人的情感和责任意识变得淡漠。当劳动的决策都交给算法来做，学生就失去了在劳动里反思、批判、创新的空间，他们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会被压制，逐渐沦为被技术规训、内在精神被侵蚀的对象。

2.4 劳动行为空心化

对于虚拟仿真和线上操作的过度依赖，会让劳动教育从“亲身去做”退化成了“指尖上点一点的符号操作”，割裂了知、情、意、行的统一，进而导致劳动场域的窄化，极易催生教育生态学中的“花盆效应”。长期处于这种人工营造的单一劳动环境，容易造成学生劳动生态幅持续收窄，劳动教育也就浮在表面，日趋变成写在纸上的劳动和虚拟出来的假象[5]，这不仅会削弱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现实适应能力，还会让他们对真实劳动世界的认知陷入虚幻，劳动教育最终沦为虚拟幻象。

3 人工智能时代高校劳动教育价值观异化的生成机理

价值观异化不是技术应用带来的偶然副作用，而是多重逻辑互相交织、逐层嵌套之后形成的系统性结果。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异化劳动”在数字时代的特殊表现，具体体现为劳动者从过程的主体变成了算法的执行者和数据的产物，人的类本质在技术的中介作用下被悄悄消解。它同时也是劳动教育生态系统在外来技术“物种”侵入、内部因素失衡的双重作用下，出现的结构性问题。

3.1 技术逻辑维度的僭越

人工智能的底层框架本身就具有“效率优先”和“精准管控”的特性，一旦介入劳动教育，极易造成劳动教育发生异化。在框架设计层面，劳动的流程被算法固化，学生从劳动的“主人”变成了依附算法的“配角”。虚拟仿真技术切断了劳动主体和真实劳动对象之间的物理接触和感官联系，让劳动失

去了亲身上手、流汗受挫的真实体验。在价值逻辑层面,效率逻辑取代了原本的育人逻辑,再加上算法过程的黑箱化,共同导致了教育目标变得功利、认知变得空泛,价值理性被工具理性压倒。人工智能遮蔽了复杂的劳动过程,很容易让学生产生技术万能的错误想法,劳动教育最终从一条让人成长成人的道路沦为单纯训练操作技能的手段[3]。

3.2 教育评价与体制维度的失序

高校现有劳动教育的评价与管理体制对工具理性的迎合以及其对育人本质的剥离,正是价值观异化得以固化并持续蔓延的直接推手。高校管理倾向于将劳动时长、虚拟产出等外显数据作为评价指标[4],这套评价体系倒逼着师生为迎合指标而开展教学活动,劳动教育被简化为追逐数字产出或流量变现的功利性竞赛,而那些无法被传感器轻易捕捉的劳动品德等质性价值则被边缘化。此外,组织真实的具身劳动教育需要耗费高昂的时间、经济乃至安全成本,在规避风险与追求短期效益的双重驱动下,高校往往倾向于选择成本低、易管理、风险小的“线上虚拟仿真”或“技能培训”,主动以虚拟空间替代现实场域,使劳动教育流于形式[6]。

3.3 社会文化与资本逻辑的裹挟

高校并非一座孤立的象牙塔,社会技术关系和文化观念都在持续改变着劳动价值观。在人机关系中,AI往往被塑造成无所不能的“主导者”,人反而退化成了数据提供者或者算法的执行者。这种“技术控制”的关系投射到劳动教育中,学生失去了自主选择权,成为算法的附庸。从劳动属性来看,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大学生,频繁参与带着剥削和异化特点的“数字劳动”,会使其产生负面的、去人格化的劳动认知,最后引发情感淡漠、责任意识不强等问题,自我主体性被持续消解[1]。加之社会舆论吹捧技术万能和贬低实干磨砺的风气,进一步加剧了劳动价值观的异化。

3.4 哲学与认知心理学维度的断裂

价值观的异化已经渗透到学生对劳动认知的整个过程。智能技术使劳动教育脱离了现实的劳动场景,虚拟的操作切断了人和劳动对象之间的真实接触,人和人之间的协作被人和机器的互动所取代,劳动教育变成了单纯的技能训练,学生渐渐脱离了真实的社会连接与情感体验,这会造成其深层心理感知的缺失、劳动意识的薄弱以及身心发展的不平衡[7]。此外,便捷的智能操作很容易让学生产生“技术能取代一切”的错误认知,这消解了“劳动创造人”的价值理念,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劳动认知的价值根基。

4 人工智能时代高校劳动教育的思政纠偏机制

价值观异化的根源,是工具理性越界压过了价值理性、教育生态出现失衡,还有劳动主体性逐步消散。想要纠正偏差,绝不是简单抵制技术或者回到旧内容就能做到,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劳动哲学作为根本依据,围绕教育生态学做系统性分析,从价值内核到实践模式、从唤醒主体到完善制度保障做全面的重构,核心要做的是打破“技术本体论”的错误认知,重新把育人放在核心位置,让技术回归到“工具理性服务于价值理性”的正确位置,达成劳动教育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和良性循环。

4.1 锚定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实现劳动教育人本复归

劳动教育价值观出现异化,首要的根源就是“技术至上”的逻辑超越了“育人本位”的逻辑。要纠正这个偏差,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理论和价值的指引,使劳动教育摆脱“适配技能”的工具主义错误,重新回归“塑造完整的人”的人本主义道路[3]。具体操作时,可以在现有理论课程框架中新增“人工智能与劳动哲学”通识必修模块,通过剖析“外卖骑手与算法困境”这类典型案例,引导学生批判性审视数字劳动中的异化现象,纠正把劳动窄化为数字产出或者技术操作的错误看法。同时,还要推进“专业+劳动”的课程思政改革,例如,在计算机、自动化这类专业课程里加入“算法劳动影响评估”环节,要求学生掌握智能技术的同时,更深刻地理解劳动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只有守住“劳动创造人”的立场,再借助“无技术日”劳动体验这类实践活动强化身体在场感,才有可能在工具理性

和价值理性的长期张力里做到辩证统一，避免技术过度挤占劳动教育的核心价值。

4.2 推进“五育融合”，构建虚实共生的生态场域

劳动教育内容变得空洞、实践场域过于虚拟化，是价值观走偏的最直接表现，必须从内容和场域两方面共同纠偏。在内容体系方面，树立全面的劳动教育观念，用“五育融合”理念统筹规划劳动教育[8]，设计“创意物化”这类跨学科项目，比如在“文创设计与3D打印”课程中，需要让学生走完从需求调研、模型设计再到公益捐赠的完整流程，防止把劳动教育简缩为单纯的数字劳动技能培训，主动融入劳动伦理、技术哲学等价值维度的思考，在实践场域方面，要坚持虚实结合的实践思路，搭建“数字孪生”劳动实践基地，设计“虚拟仿真＋真实体验”的双场景项目。比如在智慧农业教学中，先用VR技术模拟作物生长过程并进行安全演练，再进入实体农场进行耕作养护，以此解决虚拟场域情感体验不足的问题，加深学生的情感体验、培养责任意识和协作精神，最终构建出虚实共生、生态平衡的劳动实践场域。

4.3 回归教师价值引领，践行心行合一的实践哲学

劳动主体性的消解和劳动过程的异化，呼唤着教育主体的唤醒和实践过程的革新。第一，发挥教师的引领作用，推行“双导师＋双课堂”的教学模式，一方面着力提高学术导师的数字素养与智能技术应用能力，另一方面邀请行业导师传授专业技能，引导教师将育人的重心放到帮助学生树立正确劳动价值观上。比如，在智能制造实训过程中，教师可以在现场组织“工匠精神与大国重器”小型讨论，把技术操作的现场变成思政教育的现场。第二，要真正践行心行合一、“身体力行”的劳动教育观念，劳动教育的过程必须打破技术中介的冰冷界面，重构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基于真实劳动交往的情感联系。同时，建立“技术行动后的伦理复盘”常规，在每次技术实操环节结束后，增设“伦理复盘”环节，引导学生在使用技术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脱离电子设备进行面对面的价值审视和伦理判断，进而实现其从技术规训到价值自觉的转变。

4.4 打破数据评价霸权，构建多元协同的生态评价体系

评价体系的单一数字化以及制度设计的功利化，共同导致了价值观异化的固化机制。想要纠正偏差，关键是要打破“数据评价霸权”，搭建多元协同、动态调整的评价保障体系。在评价内容上，要从原来“只看量化指标”的思路转向关注学生的综合素养，建立“增值评价＋个人成长画像”的评价方式，把劳动价值观认同度、技术伦理认知水平以及社会责任感这类定性指标放到重要位置，并设立针对学术造假、抄袭剽窃的“负面清单”，对于出现负面清单行为的学生实行一票否决。评价主体方面，推行“多主体联合答辩”的考核方法，打破仅由教师参与的单一评价模式，搭建起由教师、学生、社区和第三方机构共同参与的多元评价体系，考查学生在集体劳动过程中的实际贡献以及协作能力。在评价方式上，要把过程记录和结果考察结合在一起，用AI来采集客观的过程数据，但是价值判断和最终评价要由思政教师主导，以实现从“数据驯化”到“价值澄明”的转变。由此形成的多元评价体系，能更全面、更客观地评判劳动教育的质量，其评价结果还能成为优化劳动教育生态、调整纠偏办法的依据[9]，形成“评价—反馈—改进”的生态闭环。

5 总结

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高校劳动教育面临多重价值观异化风险：技术逻辑压过了教育逻辑，评价体系的量化管理剥离了育人本质，资本文化影响导致劳动主体失落，哲学认知断裂还引发了意义层面的危机，最核心的症结在于工具理性僭越并遮蔽了价值理性。本文搭建的思政纠偏机制，旨在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引领，推动劳动教育回归育人本位，通过构建“五育融合”以及虚实结合的实践体系，强化教师引领、唤醒学生的主体性，搭建多元协同的动态评价体系来修正制度中的惯性，以此促进整个过程从技术僭越向人本回归转变。放眼未来，劳动教育的相关研究仍需在技术哲学和教育学的融合领域深入探索。一方面，要进一步细化不同类

型高校劳动教育异化问题的差异化对比分析,厘清它们在技术融入程度、价值偏差表现上的具体差异,以此提高纠偏对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需要动态关注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和深入教学领域可能产生的新风险,不断探索“技术赋能”和“育人成才”之间的平衡之道。唯有如此,劳动教育才能在智能时代的变革浪潮里,真正成为培养身心全面发展、拥有主体创造力的劳动新人的有力支撑。

利益冲突:作者声明没有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袁祖社,陈振兴. 数智时代的劳动精神培育:价值内涵、辩证审视与应对方略[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25,43(10):32-39.
https://doi.org/10.19903/j.cnki.CN23-074/G.2025.10.006.

[2] 乐晓蓉,樊熙奇. 智能时代劳动变革与劳动教育的实践理路[J]. 思想理论教育,2023(1):99-105.
https://doi.org/10.16075/j.cnki.cn31-1220/g4.2023.01.015.

[3] 刘伟兵. 作为未来教育的劳动教育: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教育研究[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4(6):62-71.

[4] 潘莉,俎岩. 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高校劳动教育研究[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2(23):56-59+63.
https://doi.org/10.19865/j.cnki.xxdj.2022.23.013.

[5] 周鹤婷. 数智时代劳动的形态之变与职业院校劳动教育的模式重塑[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3(30):43-51.

[6] 陈静. 新时代劳动教育评价的三重逻辑[J]. 中国考试,2021(12):10-18.
https://doi.org/10.19360/j.cnki.11-3303/g4.2021.12.002.

[7] 吴晓蓉,李竹欣.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应变与坚守[J]. 当代教育论坛,2024(3):66-74.
https://doi.org/10.13694/j.cnki.ddjylt.20240407.002.

[8] 周召婷,周兴国. 试论数字时代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J]. 中国教育科学(中英文),2025,8(2):107-114.
https://doi.org/10.13527/j.cnki.educ.sci.china.2025.02.018.

[9] 邵建新,何玉坤,李雪. 教育生态学视角下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困境与出路[J]. 当代教育论坛,2021(6):100-107.
https://doi.org/10.13694/j.cnki.ddjylt.20210831.001.

Value Alienation Risk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rrection Mechanisms in Labor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ZHOU Xiaoli*, SUN Yuhan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Shaoxing 312000, China)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has enabled and accelerate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yet it has also given rise to a troubling form of value alienation—one in which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ncreasingly overshadows value rationality. Drawing on Marxist philosophy of labor and educational ecology, this study looks systematically at what this value alienation looks like, what causes it, and how we might respond to these challenges. Currently, labor educatio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has four main risks: a hollowed-out perception of labor's value, a utilitarian twist in educational aims, a weakening of students' subjective agency, and an emptying of hands-on content. These risks come from several connected factors that work together: specifically, technological logic dominates excessively,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and evaluation systems are disordered, digital capital has disciplining power, and embodied cognition is disrupted. To deal with these problems, we put forward a correction framework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which is built around the idea that "value rationality should take the lead,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works as a supporting tool." This framework returns to the Marxist view of labor by putting people, not technology, at the center. It integrates labor education with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aesthetic, and labor education by combining online and offline tools to rebuild hands-on learning scenarios. It brings back the teaching role of teachers, who connect theory to actual practice, thereby revitalizing students' agency as laboring subjects. Instead of relying on simplistic data-based metrics, we adopt a dynamic evaluation system involvi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This shift reorients the entire labor education system toward value clarification, freeing it from technological discipline. For the AI era, our study offers not only theoretical grounding but also concrete pathways for developing subjective creativity and well-rounded talents.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or education; value alien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rrection; educational ecology

DOI: 10.48014/pcp.20260614001

Citation: ZHOU Xiaoli, SUN Yuhan. Value Alienation Risk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rrection Mechanisms in Labor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J]. Progress of Chinese Pedagogy, 2026, 5(3): 53-58.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Science Footprint Press Co.,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open accessed under the CC-BY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